

南來文化人： 「王韜模式」

• 王宏志

在香港文學史裏，一個經常出現的名詞是南來作家，或南來文化人，指的是那些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作家或文化人。在過去，香港曾經出現過好幾次較大規模的作家及文化人南來潮，例如抗戰初期中國大陸不少地區淪陷，香港便成為作家和文化人逃亡暫住的地方，而抗戰勝利後不久出現的國共內戰，也促使大量文化人湧來香港；更大規模的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多沒法接受新政權的人也跑來香港，然後是70年代後期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也有不少作家和文化人陸續移居香港。這是因為香港自割讓給英國後，它那一百五十多年殖民地身份構成了一個在政治、社會、經濟以至文化上都與中國大陸不盡相同的空間，為一些決定離開祖國的作家和文化人提供了特殊的活動場地。儘管這些南來香港的作家和文化人有的只在這裏作短暫停留，但毫無疑問，他們很多都在香港積極地進行創作及參與文化活動，對香港的文學及文化界有重大的影響和貢獻。

關於南來作家的問題，過去不少學者曾作過討論和界定，為我們提供一定的理解^①，但其實這個課題所牽涉的範圍很廣，包含着有關香港文學、文化以至社會、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元素，實在不容易處理。即以定義來說，就像「香港文學」一樣，人們提出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言之，凡從中國大陸來的，即在「南來作家」之列，這似乎是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可是，所有從中國大陸來香港的作家，情況都是一樣嗎？南來而北返的，跟一直在香港居住下來的，可應該有所區別？南來一段短日子而匆匆北返的，對香港文學的貢獻會有多大？真的應該視為香港文學的重要構成部分，須以特別的稱號來標示嗎？另一方面，南來後一直住下來的，為甚麼不全都稱為香港作家？為甚麼要另加標籤？這是不是意味着「南來的」跟「本土的」始終有着差異？是「本土的」排斥「南來的」？還是「南來的」不願與「本土的」混和？這其實已超出「定義」的範圍，進而涉及到諸如文化身份、社會定位等問題了。

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殖民地身份，構成了一個在政治、社會、經濟以至文化上都與中國大陸不盡相同的空間，為一些離開祖國的文化人提供了特殊的活動場地。在抗戰及國共內戰時期，香港便成為文化人逃亡暫住的地方；1949年後，很多沒法接受新政權的人也跑來香港，70年代後期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仍有不少文化人陸續移居香港，對香港的文學及文化界有重大貢獻。

* 本文為2001年香港中文大學直接撥款資助研究項目「定義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典範化準則初探」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聲明及致謝。

毫無疑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取向，以及一些際遇上的不同，讓每位從中國大陸南來的作家有着不同的故事。然而，從第一個因政治問題而在香港尋求託庇的中國文化人王韜開始^②，南來作家——或更擴闊一點，不少南來文化人似乎在重複着同一個模式，我們甚至不妨稱之為「王韜模式」。這模式來自王韜在香港「羈旅」二十三年的經歷，雖然是晚清時期，但在其後一個多世紀裏卻不斷重複出現。仔細探討王韜的南來經歷，能夠讓我們回應部分上面提出的疑問，對南來作家或南來文化人的理解也許會有所幫助。

羈旅香海

儘管有個別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但大體上今天人們都很確定王韜曾以「黃曉」的名字上書太平天國蘇福省民政長官劉肇鈞，獻計進攻上海，以致被清廷通緝，被迫逃亡；經由英國人的掩護，1862年來到香港，一直流放達二十三年之久，成為最早在這個英國殖民地長期居留的南來文化人。

我們知道，王韜早在1849年便為了謀生而到上海墨海書館從事翻譯，成為當時極少數與洋人工作和交往的中國傳統文人——美國學者柯文 (Paul A. Cohen) 筆下的「條約口岸知識份子」(treaty port intellectual) ^③，有着在這「十里洋場」生活達十三年之久的經驗，南來香港這處當時已給英人統治超過二十年的地方生活，本來應該是不會太難接受和適應的。此外，王韜初到香港也算不上舉目無親，先有福音會的照顧，然後又得到理雅各 (James Legge) 的聘請，協助從事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生活得到解決，很快便可以把妻兒接來團聚。

然而，王韜並不喜歡香港。在他筆下，香港只不過是一處「蕞爾絕島」、「荒域」^④、「蠻荒」^⑤。他在剛抵香港後寫給妻兄楊醒逵的一封信中，講述了香港給他的第一個印象^⑥：

十月八日乃抵粵港，風土瘠惡，人民椎魯，語音侏僂，不能悉辨，自憐問訊無從，幾致進退失據。

他更對香港的食物大表不滿^⑦：

所供飲食，尤難下箸，飯皆成顆，堅粒哽喉，魚尚留鱗，銳芒螫舌，肉初沸以出湯，腥聞撲鼻，蔬旋澆而入饌，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鹹之異嗜。

還有難受的天氣、惡劣的居住環境、四出為患的蛇蟲鼠蟻^⑧：

氣候不常迥非中土侔，視天常低視日近若炎，冬或著絺盛夏或披裘，魚龍怒騰欲雨氣腥臊，一黑千里颶起搖陵邱，飛蟲細蚋經冬猶不死，炎飆毒霧白晝鳴鴉鷂……瘦妻嬌女啼哭思舊土，一家四人臥牀無一瘳，半椽矮屋月費錢半萬，風逼炊煙入戶難開眸，木中蟻虱嗜人若錐利，爬搔肌膚往往至血流。

總之，一句話足以概括一切：「炎方景物種種傷吾意」^⑨。

王韜早在1849年便為了謀生而到上海墨海書館從事翻譯，成為當時極少數與洋人工作和交往的中國傳統文人。有着在這「十里洋場」生活十三年的經驗；他1862年南來香港這處當時已給英人統治超過二十年的地方生活，本應不會太難接受和適應，但王韜並不喜歡香港。香港給他的第一個印象是「風土瘠惡，人民椎魯，語音侏僂，不能悉辨。」

至於人方面，更是乏善可陳。在幾封給友人的信裏，他把香港人批評得體無完膚：

至香港一隅，叢爾絕島，其俗素以操贏居奇為尚，而自放於禮法，錐刀之徒，逐利而至，豈有雅流在其間哉！地不足遊，人不足語，校書之外，閉門日多^⑩。

竄迹粵港，萬非得已。其俗侏僂，其人獲雜，異方風土，祇益悲耳。耆好異情，暄涼異候，一身作客，四顧皆海，誠足以悽愴傷心者矣。……此間山儲石頑，地狹民鄙，烈日炎風，時多近夏，怒濤暴雨，發則成秋。危亂憂愁之中，岑寂窮荒之境，無書可讀，無人與言，曠難為懷，逝將安適^⑪。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王韜對香港絕無好感。

王韜對香港的不滿，除了因為被迫放逐外，最主要原因還是出於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華夷觀。我們在上面說過，早在王韜來香港以前，已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住了十三年，且一直跟洋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今天看來，王韜是其中一位最早接觸到外國文化的知識份子，且是直接參與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人，原是難能可貴的。可是，王韜的看法並不是這樣。對於在上海當外國人助手，「賣身事夷」，他其實是深惡痛絕的，特別當他受到周圍很大壓力時^⑫。在一封寫給舅父朱雪泉的信裏，他直率地說出了他的痛苦^⑬：

托迹侏僂，薰蕕殊臭。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飲食耆欲，固不相通，動作言語，尤所當慎。每日辨色以興，竟晷而散，幾於勞同負販，賤等賃舂。……文字之間，尤為冰炭，名為秉筆，實供指揮，支離曲學，非特覆瓿錮窗，直可投之溷廁。……同處一堂，絕少雅士，屈身謀食，豈有端人。……此邦氛濁之場，肩輹摩擊，腥羶萃附，鴉雀之聲，喧訇通衢，金銀之氣，熏灼白日。聆於耳者，異方之樂，接於目者，獲雜之形。

真是滿紙鬱怨。這種種鬱怨產生自他對外國人的歧視。在上錄一段文字中，王韜即引了《左傳》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句，而在一封寫給友人周弢甫的信中，他又重複了這句話，並接着說「西人隆準深目，思深而慮遠，其性外剛很而內陰鷙」；又說，洋人對待中國人很壞，「傭其家者，駕馭之如犬馬，奔走疲困，毫不加以痛惜。見我文士，亦藐視傲睨而不為禮。」對於西方思想的傳入，他很有戒心，「華風將浸成西俗，此實名教之大壞也」，他最害怕的就是「中原全土皆侏僂之足跡」^⑭。

另一方面，地處中國南端差不多最偏遠邊緣的香港，對於像王韜那些本着「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⑮的文化人來說本來就是「化外之地」，加上被「化外之民」英夷統治，那邊緣的身份便多加一重，成為「邊緣的邊緣」^⑯。前面所引王韜幾段有關香港的描述，裏面「其俗侏僂」、「語音侏僂」、「其人獲雜」等言詞，還有在飲食及日常生活上接近茹毛飲血的描寫，都是把香港繪畫成一處跟化外的蠻夷之地沒有多大分別的「荒隅」^⑰。事實上，王韜對於香港以及外國人的描述是多麼的接近，甚至字眼上也有相似的地方。很明顯，在上海，王韜以「華」的立場觀照「夷」；在香港，他以「中原」的立場來觀照「邊緣」^⑱。

王韜對香港的不滿，主要出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華夷觀。他對西方思想的傳入很有戒心，「華風將浸成西俗，此實名教之大壞也」。另一方面，地處中國南端差不多最邊緣的香港，對於像王韜那些本着「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的文化人來說，本來就是「化外之地」，加上被「化外之民」英夷統治，成為「邊緣的邊緣」。

從泰西之遊到《循環日報》

不過，不少學者已指出，王韜在香港期間思想開始改變，「惟我獨尊的天下觀逐漸得到修正」^①，甚至有人認為王韜在港期間「思想產生了一個飛躍」，「隨着在香港居住日久，對西學了解日深，王韜的思想發展也愈快」^②。可是，真正造成更大衝擊的是他在1867年12月開始長達兩年，歷「五洲四洋，百數國家」的「泰西汗漫之游」^③。用王韜自己的說法，這次歐遊的確能夠讓他「眼界頓開」^④，真正來一個思想上的遽變。

我們不在這裏詳細探究王韜思想的轉變及其內容^⑤。簡單而言，歐遊後，王韜對西方有了全新的認識和見解，他不但批判了自己過去所深信的傳統華夷觀——「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謂之夷，此大謬不然者也」^⑥，更重要的是他大力鼓吹變法，而變法的學習對象便是西方。在一篇自述思想改變的文字裏，王韜說自己最後「所望者中外輯和，西國之學術技藝大興於中土」^⑦，他所要強調的是「全方位地向西方學習」^⑧。

王韜居住香港期間，逐漸修正了「惟我獨尊的天下觀」，但真正造成更大衝擊的是他在1867年12月開始長達兩年的「泰西汗漫之游」。歐遊後，王韜不但批判了自己過去所深信的傳統華夷觀——「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謂之夷，此大謬不然者也」。王韜說自己最後「所望者中外輯和，西國之學術技藝大興於中土」，強調全方位地向西方學習。

在王韜出發歐洲前一年，清廷確曾派遣了第一個所謂的外交使團，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 (Robert Hart) 以及滿人斌椿的率領下到歐洲考察五個多月，不過，這使團根本沒有達到甚麼成果^⑨；而清廷正式派遣外使更是要在七年後郭嵩燾和劉鴻錫的出駐英國。因此，正如王韜自己所說，他的歐洲之行「不啻為先路之導，捷足之登」^⑩，而他透過對西方的直接觀察所產生的思想轉變，因而也比國人早得多，成就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⑪。然而，我們知道，王韜這難得的歐遊機會，卻是因為他羈旅香江而得來的——王韜在香港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理雅各在1867年初返英國，邀請王韜「往遊泰西，佐輯群書」^⑫，也就是說，香港為王韜提供了更直接接觸西方人士和文化的空間。

不過，王韜作為南來文化人，重要的地方是他能夠在香港參與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文化活動，最後更能肆意發表政治見解。

有學者指出，王韜是近代中國第一批的職業文人，靠當編輯、翻譯、報人、出版商和流行文作家謀生^⑬。在香港期間，王韜最主要的工作是幫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同時也在理雅各所主理的英華書院中擔任書院校正^⑭；他也曾兼任《孖刺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 的中文附錄《近事編錄》(The Hong Kong News) 的編輯，並兼任《華字日報》主筆，後來更與黃勝、陳言等創辦《循環日報》，王韜任正主筆。雖然我們今天沒有充足資料確實知道王韜的收入來源^⑮，但從上面有關他的文化活動的簡單描述，以及他最初孑然一身狼狽出逃，抵港後只能先寄住教會專為接待往來傳福音的人而設的臨時居所，然後終能把家眷接來，在香港生活達二十三年——他還經常抱怨香港物價太貴^⑯，足見香港確實為王韜提供了一個相當廣闊的文化空間，而他在香港所參與的文化活動也足以維持他的生活。然而，最重要的是，在香港生活期間，王韜寫出了大量作品，還整理舊作出版。較著名的除了我們在下面會再提到，為《循環日報》所寫的大量政論（部分收到《毀園文錄外編》）外，還有筆記《甕牖餘談》；外國史地著作《普法戰紀》、《法國志略》、《四溟補乘》；遊記《漫遊隨錄》、《扶桑遊記》；筆記體小說《遁窟謠言》；書信集《毀園尺牘》；詩集《蘅華館詩錄》，以及其他像《火器略說》、卷帙浩

繁的經學論著如《春秋左氏傳集釋》、《皇清經解札記》、《毛詩集釋》、《禮記集釋》、《周易註釋》等³⁵，都是王韜在香港撰寫或出版的作品。

此外，王韜對近代中國文化及政治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是他在1874年，即自歐遊返香港後四年，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是為華人辦報的開始³⁶，而《循環日報》對於中國近現代新聞業、政治以及文化都有深遠的影響。

關於《循環日報》以及王韜的辦報理念和新聞理論，已有不少學者作過研究³⁷，這裏不予贅述。要強調的是，王韜在《循環日報》上發表了大量政論。很多學者已指出過，《循環日報》最根本的特徵是它的政論色彩³⁸，因為當時中國僅有的幾家中文報紙都是屬於所謂的「新聞報紙」，即只「刊登一些國內外要事和社會消息，再加上商業行情、船舶情報等，很少對時局發表評論」³⁹。但《循環日報》每天冠首的是一篇政論，討論時局，「俾在上者得所維持，在下者知所懲創」⁴⁰。《循環日報》上的政論雖不署名，但多出自王韜手筆，數目最少在880篇以上⁴¹，既有猛烈批評中國時政，又有嚴肅討論中國自強變法之道，且觸碰很多敏感的課題，當中一些言論十分尖銳，例如他清楚指出中國遠不如西方，須認真向西方學習⁴²：

嗚呼！至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制作之樞紐。捨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以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槍炮獨精；中西同有備禦，而彼之炮台水雷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俚指數。設我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

又如批評洋務派對西學的「尚襲皮毛」：

惟所惜者，僅襲皮毛，而即囂然自以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飾雍容，終不能一旦驟臻於自強⁴³。

今沿海各直省皆設有專局，製槍炮，造舟艦，遴選幼童出洋肄業，自其外觀之，非不龐洪彪，然惜其尚襲皮毛，有其名而鮮其實也⁴⁴。

更有提出英國式君主立憲制的主張⁴⁵：

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暹等，則為君民共主之國……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籲咈，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苟得君主於上，而民主於下，則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親矣，內可以無亂，外可以無侮，而國本有若芭桑磐石焉。由此而擴充之，富強之效亦無不基於此矣。泰西諸國，以英為巨擘，而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則以君主上下互相聯絡之效也。

這些言論實在不可能見容於當時國內的官方以及輿論空間。事實上，除了政論文字外，就是他的歐洲遊記在當時也很可能需要一個特殊空間來發表，原因是這些遊記並不是一般簡單的旅遊記錄，而是滲透了他對西方新世界的觀察和讚

王韜對近代中國文化及政治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1874年創辦了《循環日報》。政論是該報最根本的特徵，每天冠首的是一篇政論，「俾在上者得所維持，在下者知所懲創」。《循環日報》的政論最少有880篇是出自王韜手筆，既有猛烈批評中國時政，又有嚴肅討論中國自強變法之道，且觸碰很多敏感的課題，實在不可能見容於當時國內的官方以及輿論空間。

美，通過這些讚美，王韜進一步凸顯出中國須全面向西方學習的必要。一段經常為人徵引的文字是⑥：

英國風俗醇厚，物產蕃庶。豪富之家，費廣用奢；而貧寒之戶，勤工力作。日競新奇巧異之藝，地少慵怠游惰之民。尤可羨者，人知遜讓，心多慇誠。國中士庶往來，常少鬥爭欺侮之事。異域客民族居其地者，從無受欺被詐，恆見親愛，絕少猜嫌。無論中土，外邦之風俗尚有如此者，吾見亦罕矣。

如果我們知道林則徐翻譯西書以作戰爭的準備，曾被琦善指為「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洋情事」⑦；魏源著《海國圖志》，對外國史地「詳求其說」，卻「已犯諸公之忌」⑧；徐繼畲「偶著《瀛環志略》一書，甫經付梓，即騰謗議」⑨，罪狀是「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⑩；位高如恭親王奕訢要求在京師同文館開設天文和算學館也遭猛烈指斥，有人大聲責問「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⑪；中國第一位派駐外國公使郭嵩燾撰寫《使西紀程》，對英國略有正面描寫，卻即被參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而遭到銷毀⑫，去世後連經由李鴻章奏請宣付國史館立傳也不獲批准，那麼，我們便可以知道王韜在1870年代在香港作為南來文化人是得到一個多麼特殊而難得的文化空間。

不是說王韜在香港發表激進言論時沒有壓力。《循環日報》上的政論不署名，且要以答客問的形式來回應不署名並不是「有乖直筆之義」⑬，可見他對此是有焦慮的。事實上，他在不少地方也顯露出他是明確知道一些言論是會惹來非議的。在倡議變法時，他知道「苟以一變之說進，其不嘩然逐之者幾希！」⑭；而在一篇贈日本友人的七古中更有這樣的詩句⑮：

年來我亦持清議，眷言家國懷殷憂；論事往往撻眾怒，世人欲殺狂奴囚。

不過，以經歷過上書太平天國而被迫流亡，但卻時常刻意隱瞞其事的王韜來說，是很清楚知道在香港發表這些言論是安全的。應該說，這些言論不但沒有帶來危險，卻因為能夠暢所欲言，說出比其他國人更尖銳精闢的觀點，王韜反而更受重視。朱維錚不無戲謔的說，王韜「堪稱晚清首例『出口轉內銷』」，為的就是李鴻章「因他已在香港辦報成名而表示願羅致入幕」⑯，有「不惜千金買駿骨」的意願。這不就是香港為流放南來文化人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文化空間所致嗎？

然而，王韜並不願意長期在香港居住下去。在剛抵香港後不久，他在日記裏寫道⑰：

噫！自經竄逐，無意於浮榮矣。但得飽吃飯，閒讀書，了此餘生，得還故鄉，亦已幸矣。

無論他的思想起了怎樣的變化，香港始終不是他的家。在自傳裏王韜清楚地說：「久居粵東，意鬱鬱不歡，恆思歸耕故鄉」，「雖流徙遐裔，僻處菰蘆，而眷懷國家，未嘗一日忘」⑱，最後，他在1884年獲准返回上海，結束了長達二十三年的流亡生活。然而，更令人遺憾的是，雖然他重返上海後確實受到歡迎和推重，且「筆耕仍勤，卻多是在報刊、畫報上換錢的『遊戲之作』」，「對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也在迅速減褪」，到了甲午戰爭，「中國改革思潮再度高漲，而王韜卻悄無聲息了」⑲。

王韜堪稱晚清首例「出口轉內銷」文人，李鴻章因他已在香港辦報成名而表示願羅致入幕。這不就是香港為南來文化人提供了特殊的文化空間所致嗎？但王韜並不願長居香港。在剛抵香港後不久，他在日記裏寫道：「自經竄逐，無意於浮榮矣。但得飽吃飯，閒讀書，了此餘生，得還故鄉，亦已幸矣。」無論他的思想起了怎樣的變化，香港始終不是他的家。他最後在1884年返回上海。

誠然，在近代中國來說，王韜的經歷是一個特例，但他的個案卻成就了隨後一個多世紀裏一個頗為完整的南來文化人模式，因而具備相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這所謂的「王韜模式」包含了以下幾個元素：一、因政治因素而被迫離開中國大陸，南來香港，尋求護蔭；二、以中原心態觀照香港文化的邊緣位置，深感不滿；三、在香港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思想上跟國內人士有所不同；四、利用香港的特殊空間從事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發表作品和言論，以尖銳的言詞及其他形式向祖國「喊話」；五、仍然希望「落葉歸根」，離開香港，返回故鄉。

在一百五十五年的殖民地歷史裏，香港接收過大量南來文化人，他們以不同形式及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這種「王韜模式」，一方面是利用了香港的特殊文化空間，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加強了香港作為大陸以外的「中國」文化空間的特殊性。當然，我們不是說這「王韜模式」的各個元素都集中或完整地全數出現在每一位南來文化人身上，有時候，部分元素較為明顯強烈，部分元素則較模糊，且個別文化人的思想、際遇以至活動都不盡相同。事實上，我們可以見到在這些元素下的不同分流：他們也許同是因為政治因素而南來，但有些人要在香港宣揚國內的主流意識形態，有些則是為了逃避或抗衡；他們有些只在香港作短暫停留後便返回大陸，又或是轉到其他地方去，無意了解及進入香港文化，即使是在香港參與文化活動，但其目的及意識都指向大陸，且時有批評香港文化位處邊緣的言詞。但也有些則在香港一直住下去，作品中慢慢出現香港的影子，貼近香港本土文化，甚至成為催生或構建香港本土文化的重要力量。他們在香港接觸到西方文化，當中有些人積極吸納，思想和作品都產生明顯的變化，具有「西化」、「洋化」的痕迹，與大陸同時期的文化產品有很大分別，但有些則卻因而加強了傳統中國以至國族主義的成分，要求寫「純正的」中文，創造「地道的」中國文學，貶斥外來的元素。當然，還有一些南來文化人根本不能納入這模式以內，他們以獨特方式回應香港的政治及文化生態^①。不過，我們在這裏提出一個「王韜模式」，目的是要以此作為具體的切入點，借助它所包含的不同元素，嘗試理解作為一個特殊文化現象的南來文化人，在中國及香港的文化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從而更好地理解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文化空間及身份。

所謂「王韜模式」包含了以下元素：一、因政治因素被迫離開中國大陸，南來香港；二、以中原心態觀照香港文化的邊緣位置；三、在香港受到西方文化衝擊；四、利用香港的特殊空間從事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以尖銳的言詞及其他形式向祖國「喊話」；五、仍然希望「落葉歸根」，返回故鄉。在香港的南來文化人，以不同形式及在不同程度上體現這種「王韜模式」。

註釋

① 當中最具啟發性的是盧璋鑾：〈「南來作家」淺說〉，載《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118-28。

② 因政治問題而被迫逃來香港，當有比王韜為早的，例如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便早在1852年已經來香港避難，1854年短暫回過上海後，又回到香港，住上了四年。不過，洪仁玕一般不被視為文化人。

③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6.

④ 王韜：〈寄穗垣寓公〉、〈寄吳中楊醒逋〉，載《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72。

- ⑤⑩ 王韜：〈與吳子登太史〉，載《弢園尺牘》，頁76-77。
- ⑥⑦ 王韜：〈寄楊醒述〉，載《弢園尺牘》，頁71；71。
- ⑧⑨ 轉引自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98；98。
- ⑩ 王韜：〈寄穗垣寓公〉，載《弢園尺牘》，頁72。
- ⑫ 王韜因為替外國人工作，受到鄉間親戚朋友指責，他的日記中記有「物議沸騰」、「姍笑者蜂起」。見王韜著，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67。
- ⑬ 王韜：〈奉朱雪泉舅氏〉，載《弢園尺牘》，頁22-23。
- ⑭ 王韜：〈與周弢甫徵君〉，載《弢園尺牘》，頁26-27。
- ⑮ 石介：〈中國論〉，載《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16。
- ⑯ 李歐梵：〈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今天》，1995年第1期，頁76。
- ⑰ 王韜後來曾寫有〈香港略論〉一文，對當時的香港作了相對來說是較正面和客觀的評論，不過，在談到自己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時，他還是說是因為「香港僻在一隅，紀述者罕」，所以要把所訪所聞記下，「聊以備荒隅掌故云爾」。見《弢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頁275。
- ⑱ 有關王韜對香港的論述，可參王宏志：〈「慕爾絕島」：王韜的香港論述〉，載《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頁215-26。
- ⑲ 張海林：〈王韜的「天下觀」與改革思想〉，載林啟彥、黃文江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頁47；林啟彥：〈王韜的中西文化觀〉，同上，頁95。
- ⑳ 忻平：《王韜評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頁81、83。
- ㉑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載《弢園尺牘》，頁102。
- ㉒④⑤ 王韜：《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101；111-12；215。
- ㉓ 有關論述，可參張海林：《王韜評傳》，頁121-226；忻平：《王韜評傳》，頁117-50；汪榮祖：《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頁90-121；另林啟彥、黃文江編的《王韜與近代世界》所收文章亦多有討論王韜的思想轉變及內容的。
- ㉔ 王韜：〈華夷辨〉，載《弢園文錄外編》，頁364。
- ㉕ 王韜：〈屢開盛宴〉，載《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160。
- ㉖ 張海林：〈王韜的「天下觀」與改革思想〉，頁57。
- ㉗ 其實，清廷這第一次外交使團根本沒有肩負甚麼具體的外交任務。從當時主理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的奏摺看，似乎這次出洋遊歷的主要對象是京師同文館的學生而不是斌椿。奏摺裏說要讓同文館學生到外國去，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在「遊歷一番」後，「可增廣見聞，有裨學業」，只是恐怕「該學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須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資照料，而行抵該國以後，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貽笑外邦」，才會讓斌椿同行。見〈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摺〉，載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20。
- ㉘ 王韜：〈自序〉，載《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頁31。
- ㉙⑳ 張海林：《王韜評傳》，頁28；149。
- ㉚ 同上，頁29。關於理雅各與王韜合譯《中國經典》，可參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第二章「香港早期之教會與理雅各歐德里等之翻譯中國要籍」及第三章「王韜在港與中國文化發展之關係」，頁15-75；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114-26.
- ㉛⑤⑥ 朱維錚：〈導言〉，載《弢園文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8；5；12-13。
- ㉜ 李志剛：〈從王韜晚年五札探其與理雅各牧師的交往〉，載《王韜與近代世界》，頁457，註14。
- ㉝ 從理雅各在1871年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可以知道，王韜當時協助譯書，每月

薪金是二十元。參Helen Edith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43。

③④ 例如他曾埋怨香港住處租金太貴，「計一椽之賃，月必費十餘金」，「蓋寸地寸金，其貴莫名，地球中當首推及之矣」。〈香港略論〉，載《弢園文錄外編》，頁276。

③⑤ 關於王韜著作，可參忻平：《王韜評傳》，附錄三：「王韜著作目錄及版本」，頁241-51。

③⑥ 《循環日報》〈本局布告〉說：「所有資本及局內一切事務，皆我華人操權，非別處新聞紙館可比」，錄自夏良才：〈王韜的近代輿論意識和《循環日報》的創辦〉，載孔令仁、李德征主編：《中國近代化與洋務運動》（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頁600。

③⑦ 同上，頁588-607；西里喜行著，鄭海麟譯：〈關於王韜和《循環日報》〉，載《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十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63-317；張海林：《王韜評傳》，頁146-62。

③⑧ 夏良才：〈王韜的近代輿論意識和《循環日報》的創辦〉，頁594。

③⑨ 〈本局日報通啟〉，錄自同上，頁596。

④① 西里喜行：〈關於王韜和《循環日報》〉，頁282-314。但後來的論者說實際不止此數，參夏良才：〈王韜的近代輿論意識和《循環日報》的創辦〉，頁600-601。

④②④③ 王韜：〈變法中〉，載《弢園文錄外編》，頁53；54。

④④ 王韜：〈變法上〉，載《弢園文錄外編》，頁52。

④⑤ 王韜：〈變法下〉，載《弢園文錄外編》，頁56。

④⑥ 王韜：〈重民下〉，載《弢園文錄外編》，頁65-66。

④⑦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上〉，載《魏源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178。

④⑧ 姚瑩：〈與余小坡言西事書〉，載《東溟文後集》，引自中國史學會編：《鴉片戰爭》，第四冊（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頁534。

④⑨ 徐繼畲：〈覆吳思澄比部世兄書〉，載《松龕先生文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523冊，頁174。

⑤⑩ 史策先：《夢餘偶鈔》（同治四年刻本），卷一，轉引自張守常：〈史料拾零（續）〉，《近代史資料》，1980年第2期，頁220。

⑤⑪ 有關同文館這次設立天文算學館的爭論，可參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324-33；Kwang-ching Liu, "Politics, Intellectual Outlook, and Reform: The T'ung-wen Kuan Controversy of 1867", in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ed.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87-100。

⑤⑫ 參王闈運：《相綺樓日記》，第六冊，「光緒三年丁丑六月十二日」（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頁25。關於《使西紀程》的銷毀，可參王興國：《郭嵩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148-52。

⑤⑬ 〈本館日報略論〉，錄自夏良才：〈王韜的近代輿論意識和《循環日報》的創辦〉，頁593。

⑤⑭ 王韜：〈悔餘隨筆〉，載《王韜日記》，頁202。

⑤⑮ 王韜：〈弢園老民自傳〉，載《弢園文錄外編》，頁385。

⑥⑰ 舉例說，葉靈鳳便不容易歸納在這「王韜模式」內。他早在1938年到來後便一直在香港定居，共住了四十六年，且早在1940年代便開始搜集香港史地的資料，專門從事有關香港的論述，從方物志到歷史掌故，以及1967年暴動期間那些言詞極為激烈的反英反殖文字。有關葉靈鳳的香港論述，可參王宏志：〈葉靈鳳的香港故事〉，《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十期（2000年3月），頁40-69。

王宏志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哲學博士，主修現代中國文學。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翻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範圍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學及翻譯。